

共建“一带一路”改变了中部地区什么？

由欧亚大陆岛的地理中枢 转变为产业中枢

支 点 洞 见

曹远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实践访问教授
著名经济学家论坛·中国经济学人论坛·成员



中部地区崛起是个区域经济学问题。它是在各区域经济发展中相互界定的,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区域的本地区特色,以及因这一特色所产生的特定经济发展方式。

中部地区曾是我国传统农耕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是中国现代工业经济萌发最早的地区,至今仍处于二元经济结构向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代表的一元化转变过程中,突出表现为相对于占全国25%的人口,中部六省GDP总量只有全国的20%左右。在这个意义上,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既是中部发展的需要,更是防止中部塌陷的必然,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全球产业链重塑未按美国所预期的方向进行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

中部地区除国内周边区域发展对其有影响外,更深刻的影响来自世界格局的变动。

在清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传统中国的塞防问题变成海防问题,而海防与塞防安全的交织,肇始了“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工业化。湖北领风气之先,有了“汉治萍”,武汉由此成为制度创新的中心,成就了武昌首义。

二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冷战格局。囿于当时的国际条件,中国只能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中东北、西北地区最为典型。随着冷战的缓和、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日益暴露,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世界主题,中部地区又“春江水暖鸭先知”,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通过农村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的现代化道路,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前,世界又一次来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取代以“世界是平的”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安全至上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再次白热化。八年前,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试图通过“脱钩断链”将自身的经济规模做得更大,让对方的经济规

模变得更小,除了吸引产业回流美国外,还希望产业转移到离美国近一点的“近岸”或者美国盟友的“友岸”,以减小西方世界经济对中国的系统性依赖,亦即通过“去中国化”来实现“去风险化”。这一全球性的产业布局调整,中部地区当然受到影响。

然而,八年来,尽管有一些企业和产业迁出中国、迁向海外,但并未全然迁到美国所预想的“近岸”和“友岸”,而是集中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据统计,随着中欧班列、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形式的快速发展,2025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6.3%,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1.9%,且还有增长趋势。同时,中东国家对华投资增长尤为明显,从而直接带动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中间品贸易的增速高达13%,不仅高于全国平均9.5%的增速,而且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中占比已达58%。中间品贸易是产业链内的贸易,其快速增长意味着以中国为基础的产业链正在“一带一路”上显著扩大和延伸。

中部地区具有经济超大规模性的天然潜质 是实现内循环的关键地带

中国经济超大规模性带来的世界影响,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并实现稳定维持的局面,中国的对外开放由此从要素流动性开放走向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为代表的制度性开放,做强做大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

我国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部地区具有经济超大规模性的天然潜质,是实现内循环的关键地带。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不仅在于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更在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产业链之间节点连接所形成的供应链网络。

前者是指将上下游企业无缝镶嵌在一条产业链中,共创一套技术流程,共同摊薄同一产品成本,共享一个现金流,使规模效益越过“企业最佳边界”而持续延伸。后者是指供应链网络的各节点可以相互耦合、相互迭代而具有“自组织、自生长”能力,从而可以持续创新,网络规模

越大,节点越多,结构越复杂,创新成功的概率就越高,新产品新产业涌现的可能性便越大。中国光伏、电池、新能源车等“新三样”产业的突飞猛进就是代表。

超大规模性是中国经济韧性的底色和经济活力的来源。中部地区人口众多,加之之南来北往的流动人口,各类人群的收入变化和需求偏好所产生的市场机会,造就了从传统农耕到现代工业多样化并存的产业生态,也形成了从小乡村到大城市层次丰富的地理结构,只要有适当的外部契机和恰当的制度创新,就可以将这一超大规模性潜质转变为现实的产业链优势。

上世纪80年代初,李崇淮教授就提出了振兴武汉经济的“两通起飞”建议,其含义就是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乘势而上深化改革,搞活包括电信和运输在内的交通以及包括物流和金融在内的流通,在带动工业的同时,凭借九省通衢的地理区位优势,内联华中、外通海

由产业“链式跃升”推动的开放 是内生的自觉自主的开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部地区不仅发展了经济,也积累了“通则不痛”的改革经验,以制度创新为上,以改革疏通痛点、重塑机制,从而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在这方面,中部地区已经创造了不少范例,其中一例就是“跨省联合收割机作业”。中部六省是粮食主产区,“三夏”是农村工作的重要环节。其中,夏收又是痛点。借助移动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有关方面相互协同,创新了制度安排,跨省组织联合收割机共同作业,消解了农户繁重的收割劳作,降低了农户的机会成本,增进了收割机户的规模效益。依此,可以想见,如果农作物可以一年几熟,联合收割机跨省作业便可以全年无休工作,其固定成本将会被持续摊薄,边际成本持续下

降,边际收益持续上升,报酬递增式的超大规模性经济性质便因此涌现。

同类案例也出现在近几年中部地区“一县一品”的乡村经济建设上。各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集中力量培养一个产品,利用直播或电商平台等新技术直接面向全国销售。如果全国1%的人口消费该产品,就是一千四百万人(相当于一个中小国家市场),足以培育一个与此相关的产业链条。河南平舆的户外产品、湖北潜江的小龙虾、江西信丰的脐橙,以及湖南浏阳的黑山羊产业,就是其中的典型范例。随着产业链的延伸,产业在下沉,产品更加细化、风格化到“一村一品”。依此推理,若是推动制度创新,使更多的县能利用产业

为什么全球产业链重塑并未按美国所预期的方向进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中国是联合国工业目录上产业最为齐全的国家,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完整工业体系。中国有二百多种工业产品位居全球产量第一,其中,百余种产品尤其是基础工业产品,比如钢铁、电解铝、石油化工等,具有压倒性优势。而这些基础工业产品,对传统工业与高新产业而言都是必需品。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不仅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地理中枢,还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产业链中枢。

“丝绸之路经济带”因自然资源和能源丰富,成为这一产业链的上游;“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因劳动力充沛而加工产业密集,成为这条产业链的下游。由此可见,正在进行的全球产业链调整是遵循经济学比较优势的原则展开的,而不是由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的考量决定和主导的。当下进行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不仅因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超大规模性而不受世界大变局的左右,反而因中国经济这一独特的竞争优势而影响世界格局的形成。这还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显示着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意义。

洋,推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

今天看来,这一建议仍具有启发意义。事实上,新的历史契机正在产生:贯穿共建“一带一路”产业链的蓬勃发,促使中部地区由欧亚大陆岛的地理中枢转变为产业中枢。由此,除巩固和发展传统粮食生产基地和能源原材料基地外,还要打造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相应地需要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共建“一带一路”陆海共济的新形势,呼唤中部地区更大规模更高层次新的“两通起飞”:在交通方面,要求中部完善“米”字型高铁网以及普速铁路、高速公路网络,加强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统筹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内河航运联动发展;在流通方面,要求中部地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作出表率,拆除区域壁垒,统一监管标准和行政司法规则,升级内陆开放平台,深度对接共建“一带一路”与RCEP,推进内陆高水平开放。

外包的形式生产中间产品,便可直接嵌入全球产业链,通达大海,走向世界。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道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按经济规律办事,就会产生将中国经济超大规模性潜力焕发出来的制度创新。一旦这种制度创新在中部率先成为常态,中部的产业发展则不再是“梯度承接”而是“链式跃升”“集群发展”,中部的对外开放也不再是以往由外向内的通道式开放,而是由内向外的制度性开放。

简言之,由产业“链式跃升”推动的开放,是内生的自觉自主的开放,是“由里及表”基于超大规模性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展现。在这个意义上,中部地区崛起,“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整理)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家谈

精于谋 勤于干

□ 曹胜亮 刘哲轩

决策是施政之始、成事之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党员干部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科学决策是苦干实干的“导航仪”,谋定而后动方能行稳致远。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来源于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是在现实和历史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工作谋划需遵循客观规律、立足基层实情。倘若缺失科学谋划,再实力的实干也容易偏离航道,甚至南辕北辙、劳民伤财。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曾用通俗道理点透调研与决策的关系:“不吃梨子,怎么知道梨子的滋味呢?”又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作喻,强调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不可省略的必经过程,还反复告诫广大干部,切不可抱有大于快上、急功近利的冲动,不能脱离实际妄想一下子抱个“金娃娃”,违背发展规律盲目铺摊子、上项目。

现实中,一些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就是把决策与实干割裂开来了。有的调研“走马观花”,坐在车里看、对着材料想,对群众急难愁盼视而不见,出台政策隔靴搔痒、药不对症;有的一心追求短期出彩,对党中央部署一知半解、对地方底数模糊不清,仅凭主观臆断拍板,催生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这深刻警示我们,干事创业首先要有“识谱”的眼界,把党中央大政方针、基层真实民情、客观发展规律摸准吃透,定准干事的主旋律。

调研越深、研判越细、论证越全,决策的科学性就越强,实干之路才不会走偏走空,这是干事创业颠扑不破的硬道理。

苦干实干是科学决策的“校验场”,笃行不怠,方能落地生根。

蓝图再好,不落地只是一纸空文;决策再精,不经实践难辨真伪。一项决策是否贴合民心、适配发展,群众是最公正的阅卷人。实干不仅是落实部署的执行环节,更是检验、修正、完善决策的动态闭环。

发源于福建宁德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生动诠释了实干对决策的反馈价值。当年习近平同志带领地委干部深入基层,立足贫困山区实情确立“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发展思路,让宏观战略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增收实效。

放眼当下,不少地方数字化转型初期重技术、轻服务,线上流程烦琐、群众办事不便,正是窗口一线人员的持续反馈和办事群众诉求的不断汇集,倒逼决策层从技术导向转向民生导向,重塑流程、精简环节,让数字化改革真正便民利民。这种“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校准政策”的实践逻辑

清晰表明:躬身入局、扎根一线,才能让科学决策持续贴合群众需求、适配发展实际。

统筹科学决策与苦干实干,不能只停留在理念倡导层面,更要落到可操作的方法路径上。

调研是连接决策与实干的第一道关口。当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材料定政策,而是走进穷山沟,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这就是“深实细准效”的硬功夫。把“四下基层”坚持好,就是要让调研贯穿决策全过程;决策前沉到一线“摸活鱼”,把产业堵点、民生痛点吃准吃透;决策中严格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多听不同声音,杜绝“一把手”拍脑袋;决策后跟进落实评估,对照群众反馈动态纠偏。只有这样,决策才不是“墙上挂挂”,实干才不是“盲人摸象”。

有了扎实的调研,还要有“瞻前顾后”的大格局。科学决策不能只盯着自己任期的“一亩三分地”,还要涵养战略耐心。最怕的是“一个新官一个样”,前任铺好的路非要推翻重来,美其名曰“改革创新”,实则是“翻烧饼”式折腾。抓工作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把长远规划拆解成年度目标、季度任务,一件一件抓落实,又要有甘做铺垫的胸襟,对那些打基础、利长远但短期内看不到成效的事,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定力。焦裕禄当年种泡桐,没想着自己能看到成材,可正是这一棵树一棵树的坚持,才有了后来兰考人“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的口碑。

当然,要让干部既敢谋事又敢干事,制度保障必须跟上。现在有些干部不决策、不拍板,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怕决策失误被追责。破解这一困局,关键在“容错纠错”与“刚性约束”的平衡。对方向正确、程序规范、出于公心、未谋私利的改革探索,要敢于包容、及时纠偏,让干部放下“多做多错”的思想包袱;但对那些违背客观规律、简化决策程序、独断专行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终身追责、严肃问责,决不允许以“交学费”为名行蛮干之实。制度有温度,干部才有闯劲;制度有刚性,决策才有底线。

决策科不科学,实干有没有效,评判权要交给群众。有的项目数据亮眼、汇报精彩,群众却无感甚至反感;有的工程场面热闹、台账齐整,实际效果却空空荡荡。这种“纸面政绩”经不起掂量。检验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看群众获得感有没有增强?办事方便不方便?急难愁盼解决没解决?这些“实感”比任何报表都更有说服力。要用好“口碑实绩”这面镜子,既看民生实效,又看过程规范,把“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真正刻进心里,自觉做到既精于谋、又勤于干,谋到群众心坎上、干到发展关键处。

(作者分别为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建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摒弃“选择性干事”心态

□ 武彦斌 席博

现实工作中,总有少数人习惯于避难就易、拈轻怕重,专挑流程简便、难度偏低、容易出成绩的“软蛋糕”,而对矛盾集中、情况复杂、攻坚难度大的“硬骨头”,则往往回避三舍、绕道而行。抱着这种“选择性干事”的心态,不仅会错过发展的好时机,还会凉了群众的心。

面对“软蛋糕”与“硬骨头”的抉择,折射的不只是工作难易的差异,更是胸怀格局与思想境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把“软蛋糕”做实,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也要把“硬骨头”啃下去,为长远发展扫清障碍、夯实基础。

政绩的积累往往始于微末。吃“软蛋糕”,也是践行初心使命的基本功,其内容涵盖改善社区环境、优化出行条件、办好养老托幼等民生小事。对群众来说,政绩不总是宏大叙事,也可能是一盏明亮的路灯、一条平整的小路、一次省心的办事体验、一个离家更近的服务站点。这些变化看似细小,却最能抵达人心,获得群众认可。

“软蛋糕”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最能体现为民造福的政绩底色。群众在一件件小事中感受到变化,就会在一次次互动中积累信任。信任多一分,治理的阻力就少一分;认同深一层,改革攻坚的基础就厚一层。吃“软蛋糕”,既是在解决当下的民生关切,也是在为啃下更多“硬骨头”积累经验和积蓄民心。

“软蛋糕”好吃易吃,但并不意味着日常工作中就只吃“软蛋糕”。在实际工作中,仍有一些党员干部流连于易见效、低风险、低成本的工作,遇到矛盾绕着走,面对难题向后退,看似勤勤恳恳,实则可能陷入避重就轻、畏难惜力的误区。只追求低难度成功,容易把工作做成表面热闹;只满足于眼前掌声,容易让深层矛盾越积越深。吃“软蛋糕”的关键,不在于拣轻活,而在于把小事办深、把实事办实。要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生活感受最直接的问题入手,既看有没有办成,也看办得好不好;既看一时有没有变化,也看后续能不能坚持。这样做,民生小事才不会停留在完成清单上,而能真正成为凝聚民心、夯实治理基础的实绩。

啃“硬骨头”是难政绩,也是实政绩。生态环境治理、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突破、基层治理提升,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所谓“硬”,往往硬在体制机制障碍、结构性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交织在一起,难以靠一时一策解决。这样的工作短期内未必显山露水,却决定了一个地方发展的后劲。对于“硬骨头”,敢不敢啃、会不会啃往往检验的是党员干部有没有担当、善不善担当,也能够检验工作是否真正着眼长远。

啃“硬骨头”的好处,往往在于其能够实现破

解发展难题的根本性和系统性问题,能够理顺发展机制,释放改革红利,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破除发展梗阻的必由之路。比如,一条轨道交通线的陆续开通运营,极大便利了市民出行,其背后是多年规划建设、跨区协同推进、施工组织保障和运营服务的衔接。产业升级短期看有压力,长远看换来的是发展质量提升;生态治理短期看要投入,长远看换来的是水清岸绿、产业向新、百姓受益。可以说,政绩“含金量”的关键是对于难题的质的破解,越是复杂的任务,越需要迎难而上担当,在要处出实招。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啃“硬骨头”本质上是对担当的深度诠释。难事更要讲方法,把情况摸清,抓住主要矛盾,把难点结所在,把握工作节奏。真正的硬仗,往往不在开工仪式上、办公会议中和各种材料里,而在生产生活的细节里和利益统筹的场域中。这要求干部在面对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时不回避、不推诿,在攻坚克难中积累治理经验、提升工作能力。

抓工作既要善吃“软蛋糕”,更要敢啃“硬骨头”,做到难易结合、统筹推进。吃“软蛋糕”能够有效回应群众关切、增强社会认同,为改革攻坚凝聚共识、营造良好环境;啃下“硬骨头”则能够从源头上破解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为民生改善提供更为坚实和可持续的制度保障。没有“软蛋糕”,发展就缺少温度;没有“硬骨头”,发展就缺少后劲。

练就“软硬通吃”的本领,关键是防止“偏食”。只吃“软蛋糕”,容易避难就易;只啃“硬骨头”则可能忽视民生所盼、脱离群众。党员干部则要俯下身、静下心来,既要养成做好民生细事的耐心与细致,也要练就放眼长远、顾全大局、破解复杂难题的视野与魄力,在多样化实践中不断提升素质能力。概言之,就是既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也要有敢啃能啃“硬骨头”的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检验政绩的标准,归根到底是人民满不满意。真正的政绩从不镌刻在自我标榜的功劳簿上,而是写在人民群众的口碑里,体现在经得起重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发展成效中。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新旧问题交织叠加,风险挑战复杂严峻,这就要求我们摒弃避难就易、避重就轻的“选择性干事”心态,既把常规工作做细做实、做出成绩,也主动认领攻坚难点任务,敢于直面深层矛盾,勇于扛责担当、主动作为,在层层闯关夺隘中推动事业行稳致远。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